试论近代中国的买办阶级

汪敬虞

近两年来，我有幸与李时岳同志就中国近代史的中心线索问题，共同进行了一次真诚的学术讨论，到最近时岳同志在《历史研究》总第二百零期发表的大作为止，讨论可以说进行了两轮。与此同时，许多学者也就与此有关的问题撰写论文或进行座谈、笔会，估计还会引起更多的人参加讨论的兴趣。这个势头如果保持下去，对中国近代史、特别是近代经济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无疑是有益的。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这个富有活力的讨论能够深入下去。因为只有深入下去，才能有利于保持活力。而要做到这一点，我认为，一个主要的途径，是设法把我们的讨论和正面的研究结合起来。我们讨论的问题，是一个大面积的问题，需要有细部的研究，注入讨论的活力。老是在大面上直来直去，无助于认识的深层化，也难以取得大体一致的共识。本着这一粗浅的想法，本文试图在这方面作一点尝试，即通过一些细部的具体事实，进行一番思索，把自己所得到的初步认识提出来，供大家批评讨论，以期引起进一步的研究。对于近代中国买办阶级问题的思索，就是这一尝试的开始。

一

买办阶级，这是中国近代社会出现的一个新的阶级。它和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 not 发展，有着很密切的关联。因此，买办阶级的研究，毫无疑问地在我们当前的讨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李时岳同志最近发表的大作中，在谈到洋务派官督商办企业的产生时，也涉及了这个问题，并且提出了和我讨论的意见。他说：“买办商人是中国资产阶级早期的重要来源之一”，“通过‘官督商办’把一部分‘诡寄洋行’的资本吸引过来，使一部分买办商人加入洋务派的行列，正是洋务运动的一大成效”。而我把“和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发生联系的新式商人”（包括洋行买办和买办商人）的附股外国洋行企业和入股官督商

办企业这两方面的投资活动，都看作“实质上是新生的中国资产阶级在两大势力之间寻求发展自己的道路”，李时岳同志“却期期以为不妥”。因为“附股外国洋行企业，便成为外国资本的附庸”，而“入股官督商办企业，买办资本遂转化为民族资本”。也就是说，买办附股外国的企业，这是反动的活动，而入股官督商办的企业，则是进步的活动，二者不能“等量齐观”。看得出来，李时岳同志是想通过对买办入股官督商办企业的肯定来肯定官督商办形式的建立，又通过官督商办的形式的肯定来肯定洋务派官僚的活动。

买办资本向民族资本的转化，即由附股外国洋行企业向入股官督商办企业的转化，它的进步意义，我在差不多十年以前，就早已提出。在那里，我曾一再说到：买办资本从外国资本的附庸向要求独立发展的方向转化，代表着买办资本向民族资本的转化，这是历史的进步。^①这就证明我并不是不知道李时岳同志所说的二者不能等量齐观的道理。而我现在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反映我放弃了原来的看法，恰恰是原来的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它是我这几年来根据实际材料进行思索的结果。它使我认识到洋行买办、买办商人和洋务派官僚在这个问题上的关系，远不是当初所想的那么简单。而我现在这样的提法，可能更接近于历史的实际。根据我的体会，这是认识过程的正常发展。

为了说明这一点，这里不妨举几个实际的例证。

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人，大都知道唐廷枢这个人物。过去论者是把 他当作买办阶级中的大买办，也就是大附庸看的。也许是因为他究竟只当过几年买办吧，现在的论者大多不那么看了。他有一位哥哥，叫做唐茂枝（廷植），这个人可以说是当了一辈子买办。不但自己当买办，而且把这个职位传给他的儿子。^②可以说，买办在他那里，是传了宗、接了代的。如果说，买办是外国资本的附庸，那么，在他那里，这个地位，可以说是铁定的，到了家的。然而，实际的情况究竟怎样呢？我们不妨翻开他的历史，看看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出生于1827年的唐茂枝，是在43岁上担任的怡和洋行买办的。在这以前他有一段相当长、但却不为人所熟知的历史。17岁以前，他在广州一所教会学校^③攻读英文。17岁离开学校进入香港英国政府新成立的华人户籍司，充当翻译。由于他在户籍司中，“处处维护中国人的利益”，年青的唐茂枝就已经为当地的中国人所称颂。但是，唐茂枝并不满足于此。他当时就预见到随着时代的进展，中国会日益卷入西方世界。他希望多看一看外部世界以丰富他对“西方方式和习俗的认识”。五年以后，唐茂枝来到美国

① 《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第116页；《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1期，第187页。事实上，这个问题，我在1963年和邵循正先生的讨论中，就已经提出了。参阅《新建设》1963年8月号。

② 1904年8月5日《中外日报》。

③ 这所学校，有的说在香港。参阅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第57—58页，1927年版。

旧金山。这个时候，加利福尼亚的采金热潮正在兴起，大批中国人也在横渡太平洋，希图取得谋生的出路。唐茂枝一到旧金山，就受到当地华人的热情欢迎。因为这里的许多中国人，曾经在香港户籍司登记过，大家都记得他那一段“处处维护中国人的利益”的历史。他的办事能力和他“在任何时候都有为他们的权利而奋斗的勇气”，使得他的同胞对他“具有充分的信赖”，从而他以一个年仅22岁的青年，被当地华人一致推为旧金山华商公所——阳和会馆的总董。唐茂枝没有辜负他的同胞的委托。在以后不久发生的美国排华事件中，由于他对当地官员的极力交涉，使得美国政府直接驱赶华侨或加课人头税以限制华人入境的企图，都未能立即实现。事情发生在西海岸的旧金山，但却闹到东海岸的首都华盛顿。连美国国务院也不得不邀请唐茂枝前往首都举行谈判，以求得事态的平息。正由于此，唐茂枝在美国华人中间，“留下了极高的声誉”。他的画像，甚至在以后多少年中，还悬挂在纽约博物馆的墙上，被题为“一个著名的中国商人”而加以纪念。^①他的行为，至今被认为是“对外御侮，不遗余力”^②。

1861年，由于家庭的原因，唐茂枝离开了旅居12年的美国，回到广东家乡。第二年，他来到上海，以首席翻译的名义，进入成立不久的上海海关税务司。实际上，他的职务，不但是通事兼译公文，而且总理进出口税单、检查进出口货物^③。在唐茂枝的心目中，这正是以他“自己的能力为他的国家服务”的良机。然而当时的中国官场，对受过外国教育的中国人，还是怀着猜疑的心理。这使得唐茂枝立即意识到：作为一个中国人，没有官的身份和品级，就很难在他的国家的公共事务中，取得进身之阶。因此他捐了一个五品同知的官衔，企图以此发挥自己的理想，让他的国家“接受西方的观念”。^④这里的“西方的观念”，当然包括了他的资本主义的理想。

然而他的盘算完全落空。五品官衔和外国税务司控制下的海关的背景，不但不能使唐茂枝施加自己的影响于清朝政府，反而弄得他声名狼籍，差一点坐进班房。

原来在唐茂枝进入海关不久，洋务运动中军用工业的建置，就已经开始发动。中国第一家大型军火工厂——上海江南制造局，筹办于唐茂枝进入海关的第二年。这个厂的筹建，和唐茂枝有过一段甚少为人所知的牵连。它从经办此事的上海关道丁日昌给李鸿章的禀帖中，透露出一点端绪。禀帖中说：“上海虹口地方，有洋人机器铁厂一座，能修造大小轮船及开花炮、洋枪各件，实为洋泾浜外国厂中机器之最大者。前曾问价，该洋商索值在十万洋以外，是以未经议妥。兹有海关通事唐国华，历游外国多年，熟习洋匠。本年因案革究，赎罪情急，与同案已革之扞手张灿、秦吉等愿共集资四万两，购成此座铁厂，以赎前愆。厂内一切机器俱精，所有匠目，照旧发价，任凭

① 以上俱见North China Herald(以下简称Herald)，1897年9月3日，第459页。

② 据美国华人历史学会资料，参见1988年12月25日《珠海乡音》，第28页。

③ 丁日昌：《巡沪公牍》，卷三，《请办海关唐国华勒索详》。

④ 1897年9月3日Herald，第459页。

迁移调度”。^①这个禀帖中的唐国华,就是唐茂枝在官场的名字。从这一段话中,至少可以看出两点:一是丁日昌想借此敲唐茂枝一下竹杠,以达到收买这家外厂的目的。唐茂枝犯的案,据说是在检查进出口货物时索取费用,实际上是接受酬劳^②。事发之后,丁日昌立即将唐茂枝的同知衔革掉,并交发上海县堂扣押审办^③。但是一当唐茂枝等答应报效四万两银子买下这家铁厂,所有罪名,立刻烟消云散。第二,唐茂枝和这家铁厂,看来有着不寻常的关系。原来索价十万以外,通过唐之手,四万即可成交,如果彼此没有特殊的关系,这就不可理解。^④从这个角度看,丁日昌是利用了唐茂枝和外国势力的关系。唐茂枝之于江南制造局,实际上是帮了大忙。后来洋务派官僚“通过‘官督商办’把一部分‘诡寄洋行’的资本吸引过来,”作法是光明正大了一些,但它的主要作用和目的,在我看来,基本上也是如此。

还是回到唐茂枝吧。毫无疑问,他本人却因此受到严重的损害。四万两赎罪费不算,他还失去了晋升海关税务司的机会。当时,总税务司赫德已经内定了两名担任税务司的中国人,但是上海关道“把其中一人投入监狱,从而破坏了他的机会。”^⑤这个人就是唐茂枝。如所周知,在赫德把持之下,中国海关各口的税务司,一律由外国人担任,中国人曾无染指的机会。唐茂枝虽然最后没有投入监狱,但失去了这个机会,就是失去了一个眼看到手的殊荣。

也许这对他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吧,唐茂枝不久就离开了海关,并于1870年进入当时最大的一家英国洋行——怡和,经理它的轮船公司在天津的业务。^⑥从此一直到他死去,始终没脱离这家洋行。总计他担任怡和买办,前后达27年之久。

接任买办以后的唐茂枝,在为洋行推进在华航运和贸易的同时,也开始扩大自己的经济活动领域。

一是附股外商在华的企业。从1874年起,他就开始附股怡和洋行的东海轮船公司。^⑦进入80年代以后,他的活动范围,又进一步扩大。仅在1881—1882两年,他

① 见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以下简称《李鸿章集》,奏稿,卷九,《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

② 在同治四年八月初一日的《唐国华赎罪片》中,李鸿章是这样说的:“因华商每遇洋船装货,所议合同及水脚总单并洋行保险凭据,均系洋字,华商往往不能辨识,嘱托唐国华翻译,偶然送给银两酬劳。续因翻译较多,并因到关纳税,应给税单妥速,遂各相沿送银酬谢。”转见《上海研究论丛》第1辑,第219页,1988年版。

③ 丁日昌:《巡沪公牍》,卷三,《请办海关唐国华勒索详》。

④ 据当时记载,这家铁厂系美商旗记铁厂,这就增加了唐茂枝和铁厂关系深厚的可能性。参阅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72页,1957年版。

⑤ S. F. Wright: *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 第840—841页,1950年版。

⑥ 1875年8月28日Herald,第214页;1897年9月8日Herald,第459页。

⑦ Liu Kwang-Ching: *Anglo-American Steamship Rivalry in China*, 第141页,1962年版。东海亦作华海。

附股的外商企业，至少有烟台纺丝局、^①上海荣泰驳船行、^②上海电光公司^③和中国玻璃公司。^④由航运企业扩大到工业企业。^⑤

在依附外国洋行提高自己经济地位的同时，唐茂枝仍然没有忘怀于原来所希冀的发展自己的道路。在他的弟弟唐廷枢所从事的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煤矿中，唐茂枝仍然是一个积极的支持者。开平煤矿之所以能顺利筹集资本，主要是通过唐茂枝的“巨大势力和努力奔走。”^⑥而1884年唐廷枢出国考察时，轮船招商局的经营，就暂由唐茂枝接替，一直到唐廷枢回国，将近两年时间。^⑦1890年，当唐廷枢又受李鸿章的札委，接办他的故乡香山县天华银矿时，所有公文账箱，尽交唐茂枝保管。^⑧一直到1897年他死去为止，唐茂枝都没有脱离这方面的活动。在死前不久，他还督促上海地方当局注意把自来水引进上海县城的重要。结果是在他死后，居住在那里的中国人，很快就“享受到他的主张带来的好处。”^⑨

从唐茂枝的全部历史看，人们只要不存先入为主的观念，他就不会不得出这样的认识：很明显，在唐茂枝的青年时期，亦即在他从美国回来之前的一段时期，他是19世纪中国最先接触西方科学和文明的人物之一。他早年在美国的一段历史，是一个爱国者的历史，具有鲜明的开拓型的经历。他离美返国之日，中国正处在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萌发时期，也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即将出世的时期。他意识到了这一点，看中了这个机会。他要让他的国家“接受西方的观念”、以“自己的能力为他的国家服务”等等，表明了他要利用这个机会。这是他的主观愿望。而在此以后他所经历的一段漫长历史，则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的曲折过程。唐茂枝之所以一方面向清朝政府捐一个官衔，一方面又在国外洋行当一名买办，正好说明中国初生的资产阶级在要求发展自己的过程中，必须在国内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中选择一个加以依靠。他在附股外商企业的同时，又积极赞助洋务派的官督商办企业和其他华商企业，则正好说明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产生的实际历程，说明新生的中国资产阶级只能在这两种力

① 1883年7月25日、1887年12月3日《申报》。

② 1892年2月9日Herald，第115页；1893年3月3日Herald，第308页。

③ 1885年4月20日《申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以下简称Daily News)，1884年4月22日，第371页；1885年5月1日Herald，第506页。

④ 1882年8月2日《申报》；Daily News，1884年4月28日，第389页。

⑤ 除此以外，他还是上海火烛保险有限公司(The Shanghai Fire Insurance Co. Ltd.)的董董。(1882年10月20日《申报》；1882年11月14日Daily News，第466页。)估计也是附股的关系。

⑥ 1897年9月3日Herald，第459—460页。

⑦ 1897年9月3日Herald，第460页。

⑧ 《徐愚斋自叙年谱》，第47页。

⑨ 1897年9月3日Herald，第460页。

量规定的范围以内，以求发展自己。这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所难以避免的道路，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必然。

李时岳同志批评我把洋务派局限于官僚，而把参预“洋务运动”的新式商人排除在外。事实上，我只是把二者作了一些区别，而根据以上所述，这种区别，看来是必要的。

当然，在同一条道路上，各人的具体情况，又复千差万别。就拿唐茂枝和他的弟弟唐廷枢比较，如果说，唐廷枢对洋务派官僚的投靠，有比较明显的倾向，那么，唐茂枝对封建官僚的依存，似乎不如他向外国势力的靠拢。他的资本中，作为“买办资本”这一部分，无疑占主要的地位。但即使如此，他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倾向，也不是完全可以抹煞。他附股外国洋行的企业，又通过附股企图把洋行的企业变成他掌握的企业，也就是变成中国人的企业，中国的资本主义企业。烟台纺丝局原来由德商宝兴洋行所有，^① 1881年增资改组。改组以后的纺丝局，“大部分股东是中国人”。^② 他们的股份占公司股本的60%。^③ 而改组活动的核心人物，就是担任公司总董的唐茂枝。^④ 他在上海平和洋行代理的中国玻璃公司中，担任了董事长。^⑤ 公司的一千股股票，他一人独占三百股。^⑥ 在第一次股东大会上，他当选为股东会的主席。^⑦ 当时，新闻纸上的报导，就把这家玻璃厂说成是中国人的企业。^⑧ 当然，这条道路在实际上是难以行得通的。终唐茂枝的一生，他始终是处在外商企业的附庸者的地位，并没有真正创办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国资本主义企业。但是，变化仍然是存在着的。到了他的下一代，向这一方面发展的迹象就非常明显。他的长子唐荣俊（傑臣，亦作杰臣）虽然继承了他的买办衣钵，虽然也是洋行企业的附股者，^⑨ 但却同时又是民族资本企业的创办人。儿子实现了父亲的遗愿，完成了上海内地自来水公司的创建，并且担任了公司的总董，^⑩ “成功地克服了所有的中国现代企业在中国官场和商界中所面临的困难。”^⑪ 他不仅投资工业，而且涉

① Commercial Reports from Her Majesty's Consuls in China (以下简称 Commercial Reports). 1877年，烟台，第39页；1881年9月30日《新报》。

② China Maritime Customs, Trade Reports, 1881年，烟台，第9页。

③ 《招商局档案》，（抄件），光绪八年五月，《烟台纛丝局规条》，经济研究所藏。

④ 1883年7月25日、1887年12月3日《申报》；《招商局档案》，（抄件），光绪八年二月初六，方汝翼致徐润函。

⑤ 1883年12月12日Herald，第673—675页。

⑥ 1883年12月12日Herald，第679页。

⑦ 1883年12月12日Herald，第677页。

⑧ 1882年8月2日《申报》。

⑨ 例如，他是怡和纱厂和公和祥码头公司的股东，参阅1897年10月29日Herald，第764页，1901年6月26日Herald，第1226页。

⑩ 1904年3月5日《中外日报》；1904年4月26日《大公报》。

⑪ 1899年9月18日Herald，第583—584页。

足矿业和航运。他曾经是开平煤矿的大股东,^①又是运河轮运的筹创者,^②他还办新式医院、^③新式学堂,^④提倡科学技术活动。^⑤在他死去之前,当上了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总董,^⑥成为上海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

所有这些,说明一个事实:中国近代民族资本的产生过程,是极其复杂曲折的。“通过‘官督商办’把一部分‘诡寄洋行’的资本吸引过来”,只是许多途径之一。而且,应该说,这不是一个顺利的途径。洋务派官僚在吸引这一部分资本的同时,不但对其它部分没有任何鼓励,而且总是卡住它们伸出来的脖子。这方面的例证是很多的。如果说,唐茂枝在进入怡和洋行以前的遭遇,只给我们间接地提供了一些推测的蛛丝马迹,那么,下面所举的叶澄衷的事例,就是一个直接的明证。

叶澄衷^⑦是研究近代中国买办阶级的学者经常提到的一位人物。^⑧他是浙江镇海的著名商人,也是19世纪下半期上海工商界乃至教育界一位颇负盛名的人物。^⑨他开过商号,开过票号、钱庄,经营过沙船,也经营过地产。然而他之著名于世,除了商号以外,还在于工厂的经营。他的老顺记商号,“连天津、营口、烟台、宁波、镇江、芜湖、九江、汉口,演迤江海五、六千里之地”。^⑩他创办的工厂,也横跨江苏、湖北两省,其中上海和汉口的燮昌火柴厂,被誉为火柴工业之翘楚;纶华缫丝厂在上海,也卓著声誉。^⑪在此之外,他还创办澄衷学堂,捐地三十亩,金十万”。^⑫在他身后也很赢得一阵声名。五四运动的著名人物胡适,就曾经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他又设立过牛痘局,

① 1902年10月29日Herald,第394页,1902年12月3日Herald,第1155页。

② 1896年1月10日Herald,第31页。

③ 1902年6月4日Herald,第1112页。

④ 1903年7月31日Herald,第237页,参阅《徐愚斋自叙年谱》,第99页。

⑤ 1896年10月16日Herald,第664页。

⑥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9),第61页,1989年2月。

⑦ 本名成忠,澄衷乃其字。参阅《清史稿》,列传286,孝义3,1977年中华版。

⑧ 如黄逸峰《关于旧中国买办阶级的研究》,《历史研究》1964年第3期;《旧中国的买办阶级》,1982年版。

⑨ 叶生于1840年7月18日,死于1899年11月5日,参阅叶胎鉴等:《澄衷府君行状》;载《叶公澄衷荣哀录》,1902年印,原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藏;1899年11月6日Herald,第906页。

⑩ 张睿:《上海怀德堂记》,载《叶公澄衷荣哀录》。

⑪ A. Wright, Twentieth Century's Impressions of Hong Kong, Shanghai and Other Treaty Ports of China,第560页,1908年版。1899年12月27日Herald,第1286页。参阅孙毓棠、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957年版,第1辑,第993—994页;第2辑,第712—713页。

⑫ 《商界名人传》,载《商业杂志》,2卷3期,1927年3月。亦说“出资四十万”,参阅《清史稿》,列传,286,孝义3。

“规划精密，务为久远”。^①还为一所西医医院提供地基。^②这说明他尊重教育、科学和现代医疗。他还担任过上海四明公所的董事。在1898年反对法国租界当局强行拆毁四明公所义地的斗争中，他是出面和法方谈判代表之一，^③通过他们的努力，最终挫败了法国租界当局的计划。这说明他有爱国爱乡的热情和表现。

然而，所有这些，过去似乎都被否定，至少是已被遗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在发迹之前，曾“掉小舟往来黄浦与番舶贸易。”^④而且这里面不仅有五金杂货，还有“侵夺我国市场”的美孚火油。就因为这一点，他不但被打入买办阶级，而且长期以来，和另一个曾经包销美孚火油的孔祥熙列於同等的地位。

然而，即使在这一点上，人们所知道的，也并不全面。为人们所不知或者忽略的是，他在和外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能“察中土之所需，径向西国厂矿考其盈绌，输货定价，”“不受居间之欺，坐得生财之道。”^⑤“察中土之所需”，这应该是为中国人服务；“不受居间之欺”，这至少不是为外国人服务。当然，这一段评语，是出现在他的一篇传记中，难免立传者有溢美之辞。但是传记中有两点事实是不能凭空捏造的：

一是在他去世二十多年以前，当左宗棠、沈葆楨主持福州船政局之时，“所需西国物料，奇形诡制，未易以译语通晓”，这时为他们解决难题的，是“通西人言语”的叶澄衷。他在所开设的老顺记商号中，“令友友悉力揣度，以应取求。夕则延西师，聚少年学贾之子弟，课以语言文字，并商务税关各窾窾。”后来“上海各商务所任使者，强半皆从老顺记习业来者。”立传人说：“今日士大夫建商务学堂，不知君於二十年以前已为之发凡起例矣。”^⑥这就是说，他是一个向资本主义学习的发凡者。

一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由於他能察中土之所需，考西国厂矿之盈绌，输货定价，所以“湖北铁政局、南北洋海军，推至於各省有机器局者，无不资以转运。”^⑦这就是说，他既是一个发凡者，又是一个实践者。

以上两则记述，可能有夸大失实之处，但总不能全是捕风捉影，凭空捏造。从这里可以看出，叶澄衷的一生，客观上有为中土奋进的一面。当然，这种奋进，一方面离不开洋务派官僚的支持，可是另一方面，又受阻於洋务派官僚而不能一帆风顺。他虽然受知於福建船政局和湖北铁政局，却受阻於李鸿章卵翼下的轮船招商局。早在1882年，他就有意於轮船航运业的开拓，曾呈请设立专营运输的广运局，为当权的李鸿章所拒

① 叶贻鉴等：《澄衷府君行状》，载《叶公澄衷荣哀录》。

② 1899年6月26日Herald，第1144页。

③ 《浙江籍资本家的兴起》，第108页，1986年版，参阅China, No. 1, (1899)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Affairs of China, 第213页。

④ 《上海县续志》卷21，第14页，1918年版。

⑤ 沈瑜庆：《叶君成忠家传》，载《叶公澄衷荣哀录》。

⑥⑦ 《叶君成忠家传》。

绝。^①1888年他又打算接办台湾商务局的轮船,又再度见阻於李鸿章和盛宣怀。^②1890年他再和其他一些商人呈请设立和兴轮船公司,复被李鸿章加以阻禁。^③所有这些加在叶澄衷头上的厄运,都是为了保持轮船招商局的独占地位。李鸿章在最后一次阻禁的批文中说:“台湾商务局尚不允行,何况他人”!^④这是因为台湾商务局还有一个刘铭传的官方背景。可见,叶澄衷的地位,还在台湾商务局之下。这些遭遇在叶澄衷心中留下的烙印,使得他后来在被邀参加盛宣怀筹办的中国通商银行时,最初“怯於共事之难,颇用长虑却顾”,只是在别人的催促下,才“矍然而起”,最后参加了中国通商银行的董事会。^⑤

叶澄衷和唐茂枝的遭遇,有一个极端相近之处。唐茂枝是在受到洋务派官僚敲诈之后,投奔怡和洋行的。叶澄衷实际上也有这样一段遭遇。他的和兴轮船公司,在洋务派官僚阻禁之下,最后打着英商鸿安轮船公司的招牌,才得以生存下来。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只是因为得不到清政府的认可,(当然更谈不上支持和保护)”才“被迫寄托于外国侵略势力屋檐之下。”^⑥李时岳同志说:洋务派的官督商办不是民间企业的巨大阻力,理由是民间商人的活动早于洋务派好多年、洋务派不能“超前”去施加阻力。现在我们从叶澄衷的遭遇中看得很清楚,洋务派的阻力,是及时施加的。而洋务派的官督商办企业,既吸收了一部分“诡寄洋行”的民间资本,又赶走了一部分民间资本去“诡寄洋行。”所谓“使华商不至皆变为洋商”是不可信的。

当然,我们“决不应忽略民族界限”。民族资本和买办资本,毫无疑问是对立的。但是在民族资本之内,官与民的对立,也不能完全抹煞。在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上,官对民的阻碍作用,始终是存在的。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民族资本的出现,却不排斥和外国势力最早发生联系的洋行买办和买办商人的力量。这种现象不但出现在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时期,也存在於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谓予不信,请看以下一例:

在1917年11月7日上海英文《字林西报》的读者投书栏中,出现了一封说明个人变故的寻常信件^⑦。但是,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者而言,这封寻常信件,却透露了一个很不寻常的消息。写这封信的人,是一家煤矿老板。他的名字,叫做刘长荫。信的

① 1887年9月10日Herald,第288—289页。

② 《李鸿章集》,电稿10,第23页。

③ 《李鸿章集》,电稿12,第22页;1890年5月2日《申报》。

④ 《李鸿章集》,电稿12,第22页。

⑤ 《叶君成忠家传》,参阅《中国第一家银行》,第107页,1982年版。值得注意的是,90年代初,他曾是香港一家外国银行——中华汇理银行(National Bank of China)的股东。(1891年4月6日《沪报》。)

⑥ 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第210页,1985年版。

⑦ 转见1917年11月10日Herald,第355—356页。

原文译如下：

“关于我的儿子弗朗西斯·刘(Francis Liou)的惨死，贵报今天以显著的地位予以披露。对于你们所表达的友好情感，我愿意表示我的感佩之情。

“贵报今天这篇文章，谈到我的煤矿，我想有一两个地方需要加以说明，以澄清可能产生的误解。

“首先，我的煤矿，不是如你们所称的太湖煤矿。太湖煤矿是有一个的，但我不能肯定它现在是否仍在开工。我那座煤矿，是在靠近太湖的长兴。它位于浙江省，而你们所指的太湖煤矿，位于江苏。

“你们好像着重暗示我非常急需资金以推进我的煤矿的发展。然而事实完全不是这样。至少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不需要外国资本。如所周知，中国人的习惯，总是要在集股之前，设法搞清楚这个企业的价值。当我确信我所需的资本会从我的中国朋友那里征集得到的时候，我实际上已经在着手生产煤炭。它可能是小量的，但已表示这个煤矿实际上已经开工。

“最后，关于我这座煤矿所产煤炭的销售价格。现在就决定它在上海的售价，还为时过早。不过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我的煤炭要比从日本进口的煤炭便宜。不过，你们也能理解到，煤炭的生产成本主要决定于单位时间的产量，产量愈高成本就愈低，从而销售价格也愈加便宜。这个问题暂时可以摆一摆。但是，我要说明一点，那就是当我的计划充分发展到足以达到我的目标之时，我丝毫不去顾虑把我的煤炭投放上海市场会发生任何困难。”

现在按照信件原文的顺序，作几点必要的说明，

一、关于弗朗西斯·刘的惨死。弗朗西斯·刘的中文名字叫刘立德^①，是刘长荫的次子。^②1915年刘长荫延请德国矿师毕象贤(M. Bruecher)规划长兴煤矿，改用机器生产，又请德国矿师库踪驻矿督率开采，刘立德就按照父亲的意旨，“随同习练”，^③很快熟悉了全矿业务。“在刘立德监督之下，开采了很多有价值的煤层，给人以巨大的希望。”^④不幸在1917年10月25日下午，当刘立德在井下工作时，由于瓦斯爆炸，重伤身死。^⑤

二、关于长兴煤矿。它位于浙江长兴县城之西45里，矿区面积71平方里，储煤

① 盛竹书：《长兴煤矿调查记》，载《上海总商会月报》，第2卷第7期，1922年7月。

② 1917年11月3日Herald，第271页。

③ 盛竹书：《长兴煤矿调查记》。

④ 1917年11月8日Herald，第271页。

⑤ 1917年11月3日Herald，第271页，《矿业周报》，第13号，第211页，1928年8月28日。

近一亿吨。^①这个矿的手工开采，有很长的历史。有的说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②有的则上溯到乾隆以前。^③刘长荫接办长兴煤矿，大约在1913年。在他接手以前，长兴商人锺仰貽集资用土法开采，大约已有两年。^④刘长荫接手之初，仍沿用土法。^⑤1915年才聘请外国矿师，开始改用新法。到1917年刘立德遇难之日止，煤矿的竖井已深二百英尺，井下已安置了抽水机，煤炭日产量可达70—100吨。整个开采面的煤炭储量，达到三千万吨。^⑥刘长荫之所以强调要把他的煤矿和太湖煤矿加以区别，看来就是要强调这个煤矿在他的手中，第一次由土法的手工生产改变为新法的机器生产。因为在太湖周围地区，有不少历史很长的手工煤窑，而转变为机器生产的现代煤矿，则是他的首创。

三、关于煤矿资本。刘长荫最初接办长兴煤矿，在筹集资本方面，经历了不少的困难。当初怂恿他接办并答应为他筹款的人，在煤矿开办几个月以后，不但筹款“踪影全无，反被骗去银千余两。”^⑦但是，刘长荫并不因受此挫折而求援外国资本。他在信中所说的“我不需要外国资本”这一句话是符合事实的。在他的爱子遇难之后五年，有一位曾经实地调查过长兴煤矿的人写道：“刘君因经几载艰辛，且痛子情切，是以当时有国人愿出二百万金，购此矿区，亦有某国人愿出资合办，而刘君一概谢绝。盖刘君以为如合外资，不独有负当年倡办之苦心，且亦无以对以身殉之儿子也。”^⑧这个“某国”当时是谁都清楚的。英国觊觎浙江矿产，至少，从19世纪末叶，就已经开始。^⑨就在刘立德殉职的同一时间，上海租界英国当局就已经叫嚷要在已有的发电厂、煤气厂和自来水厂，也就是在水、电、气之外，还要解决煤炭的供应。他们直截了当地提出要由租界当局出面，在上海附近占有一座煤矿，由租界当局进行开采，以保证上海租界煤炭的充分供应。他们认为最理想的办法，是出资打进中国现成开采的煤矿，这样既节省开办资金，又能加速煤炭供应，一举两得。^⑩很明显，就在上海跟前且又正在开采的长兴煤矿，无疑是租界当局攫取的最佳对象。刘长荫说：“你们好像着重暗示我非常急需资金以推进我的煤矿的发展。”这个“你们”，一望而知，就是上海租界当局，因为《字林西报》正是上海外国租界当局的喉舌。而他所说的“事实完全不是这样”，则证明他在

① 《矿业周报》，第7号，第111—112页，1928年7月17日。

② 1917年11月10日Herald，第352页。

③ 盛竹书：《长兴煤矿调查记》，《矿业周报》，第7号，第111页。

④ 谔新：《参观长兴煤矿记》，载《钱业月报》，第2卷，第1期，1922年。

⑤ 盛竹书：《长兴煤矿调查记》。

⑥ 1917年11月10日Herald，第352页。

⑦ 盛竹书：《长兴煤矿调查记》。

⑧ 盛竹书：《长兴煤矿调查记》。

⑨ 1899年1月16日Herald，第70—71页。

⑩ 1917年10月13日Herald，第61页。

对待外国资本的入侵上，有高度的警惕心和坚决的抵制态度。

四、关于煤炭销售和煤价。这也是和当时的内外形势联系在一起的。早期上海用煤，大部仰给于日本。^①国内所产之煤，只占上海用煤之一部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海上运输的紧张和国内储备的需要，日煤对上海的出口，受到很大的限制。上海市场，供不应求，加上商人垄断居奇，煤价因而飞涨。就在刘长荫写这封信的时候，上海市场国产煤价，每吨由一年前的23元上升到30—32元，平均每吨价格增长7—9元，日本进口煤则每吨猛长14元。市场的行情预测是：“40元一吨完全在可能的限度以内。”^②在上海煤炭价格、特别是进口日煤价格迅速增长的形势下，刘长荫在他的信中所说的：“我的煤炭要比从日本进口的煤炭便宜”，就有鲜明的针对性和巨大的积极意义。他的煤矿，就在上海的左近，煤炭运到太湖边，就可以通过水运，由太湖经苏州河直达上海。刘长荫自己估计，他的煤炭运到上海，成本不过每吨4元，零售价格至多每吨12元^③。他在信中的最后说：“我丝毫不去顾虑把我的煤炭投于上海市场会发生任何困难。”他所表现出来的那么坚定的信心，体现了他抵制洋煤的巨大勇气。这和他拒绝外国投资的坚定态度联系起来，强烈的民族意识，是任何人都可以察觉到的。

在以后的六年中，长兴煤矿的历史，记录了刘长荫的奋斗历程。他在1918年将独资的长兴煤矿扩大为股份公司，资本增加为220万元，其中刘长荫在矿区原有的各项设备折作资本100万元，另招新股120万元。新增加的股东中，有朱葆三、朱志尧、虞洽卿等十人为董事，刘长荫则为董事兼总经理。^④三年以后，（1921年4月），由股东会议决：增加股本110万元，由原股东摊认，连同原有股本共计330万元。推朱葆三为经理。^⑤这时矿区面积已超过70平方里，在老井之外，又新开一井，每日产煤量增至150吨。^⑥到1924年停工以前，全矿累年共产煤30万吨。^⑦日产量达到600吨。^⑧由新矿区至五里桥水运码头，新建了52里轻便铁路，大大加速了煤炭的外运。^⑨供应范围包括“距矿百哩以内的苏州、无锡、常州、宜兴、嘉善、杭州等地，极为方便。”而

① 1917年上海用煤150万吨，其中来自日本的，为80万吨，占一半以上。参阅1917年11月17日Herald，第412页。

② 1917年11月10日Herald，第351页。

③ 1917年11月10日Herald，第352页。

④ 盛竹书：《长兴煤矿调查记》。

⑤ 《矿业周报》，第78号，第475页，1930年1月14日。

⑥ 濂新：《参观长兴煤矿记》。

⑦ 《浙江省矿产调查报告书》，第5页，1928年版；《矿业周报》，第7号，第111页，1928年7月17日。

⑧ 《中国矿业纪要》第三次，第128页；《矿业周报》，第7号，第111页。

⑨ 濂新：《参观长兴煤矿记》。

这些地方从前乃是英国资本开滦等矿的推销范围。^①然而，就在这一年秋天，军阀混战波及到这个矿场。经营六载，初见成效的浙江唯一现代煤矿，一朝毁弃，损失达490万元之巨。^②

这样一个积极投身于发展民族工业，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实业家，查一查他的历史，原来是一个“历任各洋行华经理四十余年”的洋行买办。^③他的家族在上海是“法国社会中最为人所熟悉和最被人所尊敬”的家族。^④1909年他又与英商祥茂洋行(A. R. Burkill & Co.) 合资设立了一家资本在30万元以上的立德油厂，^⑤实际上是附股于外国企业，称得上是外国资本的附庸。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他又开始了独立创业的生涯。早在1910年前后，他就开始涉足航运企业，曾经经理过一家航行杭州、湖州和上海的申湖、杭湖航业公司。^⑥与此同时，有人说他“对于煤矿本甚注意”，“深知开矿非资力雄厚不足以利进行”。原来对接办煤矿，是持慎重态度的。但是，在遭受种种挫折之后，他变得更加坚定起来，不但没有丝毫退却，反而“愤极，不得已勉自承办”，坚持到底。^⑦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事业的前进道路上，当困难发生之时，给他援助之手的，却不乏和他同样出身洋行买办的人物，也就是他在信中所说的“我的中国朋友”。1918年他的独资矿场改组为股份公司以后，重要的投资者，几乎全是买办。像上面提到的朱志尧、虞洽卿和朱葆三等人，都和他有同样的历史和经历。他们都在充当洋行买办的同时或以后，投身于工矿交通企业的创设。如所周知，朱志尧是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的买办，又是著名的求新船厂的创办者和同昌油厂、同昌纱厂、申大面粉厂、大通轮船公司等一系列企业的董事或股东。^⑧虞洽卿长期是德商鲁麟洋行的买办，其后又担任过华俄道胜和荷兰银行的买办。但他又是有影响的宁绍和三北轮船公司的主人。他在担任外国银行买办的同时又和外商轮船公司进行激烈的竞争。^⑨至于著名的平和洋行买办朱葆三，则“所营不名一业”，其中属诸银行者五、保险者四、航运者六。其他如自来水、水泥、煤炭、电

① 《刘鸿记账房存卷》，见《刘鸿生企业史料》上册，第11页，1981年版。

② 《浙江省矿产调查报告书》，第5页；《中国矿业纪要》，第三次，第128页。

③ 中国征信所：《工厂商号调查表》，（原件），经济研究所藏。

④ 1917年11月3日Herald，第272页。

⑤ 1911年4月15日Herald，第157页；《工厂商号调查表》（原件）；《中国通商银行档案》，参阅《中国第一家银行》，第148页，1982年版。

⑥ 盛竹书：《长兴煤矿调查记》。

⑦ 盛竹书：《长兴煤矿调查记》。他还有开采铅矿的计划，参阅《农商公报》，第32期，政事，第3页。

⑧ 《中日实业家兴信录》，第241—242页，1936年版。

⑨ 1899年6月26日Herald，第1144页；丁日初、杜恂诚：《虞洽卿简论》，载《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

气、面粉、造纸、榨油、化铁、毛绒、纺织、新闻诸事业，“无所不办。”^①他们的政治经历和归宿，各有不同，但是他们的这一段经历在近代中国的洋行买办中，不是个别现象。

可以看出：长兴煤矿的出现，如果可以作为买办资本向民族资本转化的典型，那么“一部分官僚、士大夫”和他们的结合，在这里是看不到的。这里看不到一丝一毫官僚和士大夫的协助，相反，它的一朝毁弃，却是军阀混战中的牺牲。而战乱之余，全矿又被新军阀国民党政权以“一纸命令”轻易接收过去，^②霸占达四年之久。^③

因此，结论仍然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势力的夹缝中生长的。它自己缺乏独立发展的力量，寻求依赖一方以求发展自己，几乎成了客观的规律。然而，他们的目的，并不能顺利实现。作为外国资本的附庸，出路肯定是没有的，而投靠洋务派官僚，也并未能看到光明的希望。如果说前者是由附股外国洋行企业转向入股官督商办企业的一个因素，那么，后者则是官督商办最后破产的主要原因。洋务派中人，即使按李时岳同志的定义，把商人包括进去，官与商彼此的地位和作用，也是不能“等量齐观”的。官督商办固然是中国资本主义所赖以产生的主要形式，但洋务派官僚并不足以承担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这不是一句空话，也不“恍惚迷离”。在吸引“诡寄洋行”的资本的问题上，同样如此。即便这一部分资本被“官督商办”吸引了过来，实现了买办资本向民族资本的转化，整个民族资本的顺利发展，并没有得到保证。这是我们上述的例证所充分证明了的。

二

以上是我与李时岳同志的讨论，我举了一些买办资本向民族资本转化的实例，但这是不是意味着买办阶级在中国近代社会之中，不是反动的阶级而是一个进步的阶级了呢？从这里能引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的确，在某些学术讨论会上，个别同志提出过这样一种看法：中国近代社会中的买办阶级，并不是一个反动的阶级，而是处于上升阶段的阶级，是一个富有生命力的阶级。它对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进步作用是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的。这个阶级不但出现了唐廷枢、徐润这样的实业家，而且出现了容闳、郑观应这样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和爱国知识分子，他们起到了中国近代化的生力军的作用。虽然这仅是个别同志的看法，但是，究竟应该怎样认识这个问题，看来值得提出来加以讨论。

① 《商业杂志》，2卷1期，1927年1月。

② 《矿业周报》，第16号，第270页。1928年9月21日。

③ 《矿业周报》，第11号，第183页，1928年8月14日，第211号，第678页，1932年10月21日。

首先需要弄清楚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买办阶级？

在已有的研究和讨论中，几乎成为一个共同点的是：买办阶级或买办资产阶级的内涵，就是洋行买办以及为洋行乃至同洋行做生意的所谓买办商人。洋行买办和买办商人，不论任何条件，不区别任何情况，都一律划归买办阶级或买办资产阶级。买办阶级等同于洋行买办，这已成为迄今研究者的统一口径。

这种说法，实际上并没有充分的理论作为根据的。

关于买办阶级的理论根据，到现在为止，大家都是遵循毛泽东同志的原则分析。它是在中国革命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正确认识，这应该没有疑问。毛泽东同志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划分，历来按照大、中、小的原则，即历来是把中国近代的资产阶级分为大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三个部分。由于大资产阶级带有买办性，所以在提到大资产阶级的时候，有时径直称为买办阶级，有时则在大资产阶级的前面，加上“带买办性”四个字，称为“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①或者简称“买办大资产阶级。”^②到了后来，也就是到了国民党的统治后期，大资产阶级发展成为官僚资产阶级，出现了“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即官僚资本主义^③。官僚资本阶级，这是买办大资产阶级发展到了最高峰，是大资产阶级的势力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迅速膨胀的结果。然而，迅速的恶性膨胀，注定了它的短命。这时距它在中国大陆覆灭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因此，这不仅是历史的具体存在，而且是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是中国近代史的客观现实的演变。

由此可见，对毛泽东同志使用过的“买办阶级”或没有正式使用过的“买办资产阶级”，都应该作为大资产阶级来理解。其所以称大资产阶级为买办阶级，是因为这个阶级带有买办性，即它“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④它是“直接为帝国主义服务并为它们所豢养的阶级。”^⑤洋行买办，作为一个整体，当然也是“直接为帝国主义服务并为它们所豢养”，但买办阶级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洋行买办，从理论上讲，这是明白无误的。

如所周知，一个阶级不能转化为另一个阶级，但阶级中的个别分子是可以转化的。和其他阶级中的个别分子一样，单个洋行买办或买办商人都是可以转化的。买办或买办商人由附股洋行转而入股官督商办企业，就是明显的转化。这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就这些单个人来说，这都是一种进步的表现。

但是，从这里能引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

① 《毛泽东选集》(1964年合订一卷本，下同)，第63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32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253、1279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3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598页。

这只能说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道路的曲折，只能说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所面临的环境的特殊。这样一种曲折的道路和特殊的环境，只能规定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 not 发展，规定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和革命的软弱性，却得不出买办阶级是一个进步阶级的结论。这正是表现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依赖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结论。”

判断一个阶级是进步还是反动，决定性的标准是看它所处的历史地位、所起的历史作用。买办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从它在中国近代社会中的地位和它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看，它之所以构成一个反动的阶级，这是由中国的客观历史条件，亦即社会经济条件所规定的，这是客观的存在。买办中出现了容闳、郑观应那样“先进的中国人和爱国知识分子”，改变不了这个客观的存在。买办中出现了唐廷枢、徐润那样“投资或兴办近代民族工业”的“实业家”；买办资本存在着向民族资本转化的可能性，所有这些，也改变不了买办阶级作为一个反动阶级的客观存在。容闳把自己在宝顺洋行当买办的一段历史称之为他一生中的“黑暗时期。”^①这只能体现容闳个人的感触，不能代表整个买办阶级的阶级意识；郑观应慨叹西方侵略者在中国“尊己抑人，任情蔑性。”^②这只能反映郑观应个人的思想，也不能代表整个买办阶级的阶级观点。唐廷枢筹办新式银行，规定只收华人资本，对外资采取排斥的态度。^③这只能说明曾经当过洋行买办的唐廷枢，“以其在洋行的丰富经验去损伤外国公司”，^④而不能证明唐廷枢的行为代表整个买办阶级的活动。徐润投资上海地产，看到租界中外国“经济之宏、力量之大”，也曾发过租界当局“不知履足，日谋扩充，日图推广，政令不行，主权日削”的浩叹^⑤。这也只说明一个在洋行中陷得很深的买办在向民族资本家转变过程中的逆反心理，也证明不了这是整个买办阶级的心理状态。道理很简单“单独的个人并不‘总是’以他所从属的阶级为转移”。^⑥即使把容闳、郑观应、唐廷枢和徐润都划入买办阶级，也否定不了买办阶级作为一个反动阶级的客观现实。

什么是中国买办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呢？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也有明确的概括：

“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买办制度”，“造成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阶级”。这就是买办阶级的地位。^⑦

① H. N. Shore, *The Flight of the Lapwing*, 1881年版, 转见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八), 第420页, 1961年版。参阅容闳《西学东渐记》, 第48—49页, 徐凤石等译本。

② 《易言》(20), 第11页, 转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集, 第184页, 1982年版。

③ 1876年12月21日、12月26日《新报》; 1876年5月20日《申报》。

④ 《洋务运动》(八), 第402页。

⑤ 《徐愚斋自叙年谱》, 第4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第183页, 1972年版。

⑦ 参阅《毛泽东选集》, 第628、1488页。

“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的通商都市直至穷乡僻壤，造成了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以便利其剥削广大的中国农民和人民群众。”这就是买办阶级的作用^①。

这两个方面的集中表现，在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临近崩溃之时，就是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国民党政权。

对于这样一个原则性的概括，现在学术界中多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先说买办阶级的地位。有的认为买办有自己的独立经济，他在为洋行做买卖之外，还有自己的买卖。他经营自己的买卖时，有自己的牌号和人马，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但是能否据此认为买办是中国近代史上新兴的富有阶层，并不总是依附于洋行，因而不能把买办阶级置于外国附庸者的地位呢。

的确，洋行买办，一般都有自己的经济活动。有些买办在其所服务的洋行之外，还有自己的行号和招牌。徐润在担任宝顺洋行买办期间，先后设立了绍祥丝号、润立生茶号和宝源丝、茶、土号，经营丝茶鸦片生意。除此三项大宗以外，还开设了顺兴、川汉各货号，经营烟叶、皮油、白蜡、黄白麻和各种桐油，复以余力经营一家绸庄和一家布号。^②他们有的也有经营洋行和自己的买卖所必需的一套办事机构。沙逊洋行的买办胡梅平就有一个庞大的事务所，其中单是看银师就有五名，另外还有文书、会计多人，配套齐全。他老板的洋行，设在租界里面，而他却把自己的事务所，设在华人区。^③怡和洋行买办唐廷枢的事务所，其内部规模扩大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他老板的航运代理部，也要安置在他的事务所中^④。他自己的买卖，的确是自负盈亏，不与洋行老板发生关系。常常是主人“在营业上失利时，买办却发财致富。”^⑤“外国人破产了，买办则变为安享荣华的富翁。”^⑥

同样，很多洋行买办也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有不少研究者估计过买办的收入和积蓄。不管彼此差距如何，总归是一笔很大的数字。^⑦有些洋行老板的确还不如他的买办富有。很多人都知道，早期的西方冒险家到中国来，除了买船票的钱以外，别无长物。有的甚至拿买办的保证金做白手起家的生意。“但凭一房屋，挂一招牌，觅一垫

① 《毛泽东选集》，第 623 页。

② 《徐愚斋自叙年谱》，第 2—14 页。

③ 1885 年 4 月 15 日 Daily News，第 347 页；1885 年 4 月 17 日 Daily News，第 355—356 页。

④ 刘广京：《唐廷枢之买办时代》，载《清华学报》1961 年 6 月，第 167 页。

⑤ Commercial Reports, 1869—1871, 中国，第 25 页。

⑥ Commercial Reports, 1878 年，琼州，第 110—111 页。

⑦ 王水：《清代买办收入的估计及其使用方向》，载《经济研究所集刊》第 5 集，1983 年 2 月。

钱之糠摆渡”，即可“各处兜揽交易。”^①美国旗昌轮船公司老板金能亨眼看长江航运有利可图，却拿不出必需的资金，以至不得不从中国的买办和其他商人手中募集开办资本。^②英国汇丰银行在基础巩固之前，遇上资金周转的困难，也曾经得到过它的买办大笔存款的接济^③。琼记洋行老板何德(A. Heard)对旗昌的买办陈竹坪的评价是：“从他拥有的资财来看，他是一个我们要向之磕头下拜的人”。^④而旗昌洋行的老板，甚至说怡和买办唐廷枢可以把他们“打得一败涂地”。^⑤

买办不但有独立的经济力量，似乎还有洋商所不可企及的政治力量。1886年汇丰银行总经理乃则臣(T. Jackson)为了便于和清朝衙门打交道，竟通过他的买办罗鹤朋捐了一个三品顶戴。在一封私人信中，罗鹤朋向他的主人表起功来，说是“起先只打算给你一个四品衔，但是通过我的努力和说情，现在我给你弄上了一个三品顶戴。这相当于一个按察使的地位。”^⑥

显然单从这些具体材料看，洋行买办有很大的能量和独立性，并不是洋行的附庸。然而，客观的实际，显然不是这样。

所谓附庸，指的是买办阶级的阶级地位，指的是它在近代中国社会中依附于帝国主义的位置。帝国主义在中国既造成了买办制度，又造成了活跃在这个制度下的买办阶级。一个是制造者，一个是被制造者。制造者总归是指挥着被制造者，被制造者总归是听命于制造者，这一点是不移的。不管买办阶级怎样跳动，启动的钥匙是掌握在帝国主义手中，这是无疑的。不管怎样把洋行买办描绘得多么神通广大，如果没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存在，买办阶级便一天也存在不下去。这是中国近代历史的现实。

至于个别洋行买办，则可以千差万别。有富埒王侯之家，也有潦倒洋场之辈；有的看上去的确经济独立，有的则离开了洋行便不能生活。他们的名字都叫买办，但权势地位，各人各不相同。具体到每一个人，就需要具体分析，这是不言而喻的。

现在我们再来看买办阶级的作用问题。在这里，毛泽东同志的概括，是提出了问题的实质。他提出的问题，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剥削问题。剥削的方式是通过包括整个买办阶级在内的买办的、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剥削的对象是中国的农民和其他劳动者。总的来说，买办阶级的作用就是为外国资本主义的这种剥削提供服

① 1881年1月19日《新报》。

② Liu Kwang-Ching, *Anglo-American Steamship Rivalry in China*, 第26页。

③ Frank H. H. King, *The Hong Kong Bank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864—1902*, 第517页, 1987年版。

④ Hao yen-Ping, *The Compradore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第99—100页, 1970年版。

⑤ Liu Kwang-Ching, *Anglo-American Steamship Rivalry in China*, 第93页。

⑥ 汇丰银行档案, 转见 Frank H. H. King, *The Hong Kong Bank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864—1902*, 第551页。罗鹤朋, 亦作罗鹤平, 即在中国官场颇有名声的罗寿嵩。

务。

但是,有的西方学者却认为:买办制度并没有起到扩充洋行贸易的作用,相反,它把贸易转到中国人的手中,“使外国沦为经理代销的地位。”“除了在较大的通商口岸之外,外国商人就要消踪灭迹了”^①中国人“已经建立起一个垄断”。^②“买办开开了中国的大门”,并“掌握着钥匙”。^③这就是说,买办制度不仅不是为外国资本服务,而且对外国资本是有害的。而国内有的同志在论及东西方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时,认为买办阶级的经济活动在客观上起过明显的积极作用。还有的同志在谈到市场问题时,认为外国制品在中国的市场,只限于城市富有阶层消费的精制产品市场,而中国国内产品的市场,是以广大农村为主体的粗制产品市场。中国纱厂生产的是粗纱,外国进口的和外国在华纱厂生产的都是细纱;中国烟厂生产的是低级香烟,外国进口和外国在华烟厂生产的是高级香烟。它们各有各的市场,不存在中外资本的竞争问题。这也就是说,买办制度谈不上对准有利,对准有害。

然而,这些都是真的吗?难道外国产品就满足于少数城市的市场吗?外国铁路不是早在本世纪之初就已经修到中国的边远地区的云南了吗?外国轮船不是更早地于上个世纪之末就已经开到长江上游的四川了吗?这时的条约口岸不是已经由沿海沿江一直伸到“只有双轮车、独轮车,乃至人背、牲口驮才能到的地方”了吗^④?这难道是“只限于大城市”吗?贸易落入华人手中的天方夜谭,不是连外国人自己也不相信了吗^⑤?一直到中国大陆解放的前夕,在华商中间,不是还有人慨叹“洋商势力渐由通商口岸而伸入内地,华商降为代理行,经手取佣而已”吗?^⑥买办开开了贸易的大门,但是真正掌握了钥匙吗?买办制度下的贸易,难道真的自主吗?难道买办真的帮助贸易落入华人手中了吗?难道他们不是靠剥削中国的小生产者以肥他们的主人并且自肥了吗?在中国茶农和小茶贩“对国外市场的情况全无了解,他们唯一的市场就是当地的洋行”的条件下,“卖茶的钱究竟落到谁的手里了?”这不是早就有人提出来了吗?真正交到种植者手中的少得可怜,不是外国人也承认的吗?^⑦精制的外国产品和粗制的中国产品在中国市场上难道真的是各得其所吗?难道就没有一点压迫和被压迫、排挤

① N. A. Pelcovits, *Old China Hands and the Foreign Office*, 第 94、103 页, 1948 年版。

② 1881 年 7 月 21 日 *Herald*, 第 57 页。

③ Frank, H. H. King, *The Hong Kong Bank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864—1902*, 第 620 页。

④ U. S. Treasury Department, *Commercial China in 1899*, 1899 年版。

⑤ Pelcovits, *Old China Hands and the Foreign Office*, 第 10 章, 参阅 *Trade Reports*, 1868 年, 牛庄, 第 65 页, *Commercial Reports*, 1864 年, 汉口, 第 21 页。

⑥ 中国通商银行:《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 1947 年版, 第 33 页。

⑦ *Commercial Reports*, 1883 年, 淡水, 第 200 页。 *Trade Reports*, 1883 年, 淡水, 第 262 页。

和被排挤的存在吗？至于中西文化的交流，西方文明的输入，这当然是有的。但是，通过买办制度的桥梁所获得的西方文化，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十里洋场的租界，是买办文化最集中的地方，难道他们说租界是“文明世界的地方政府的模范”，^① 我们也就承认了吗？所有这些都，都是不难回答的问题。

不错，经营外国商品或本国出口商品的商业，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几乎都存在过。不能不加区别一律都套上买办制度的帽子。买办制度之所以出现于近代中国，主要的、决定性的一条，是由于外国的侵略。这种制度下的贸易，对入侵者而言，它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具有特权的性质。中国商人“逢关纳税，遇卡抽厘”，外国商人只须一次子口半税，便可通行无阻，这是尽人皆知的一条。“中国从未能在不得列强同意下，自行决定对外国商品征收一税。”^② 这是包括台湾学者在内的所有中国学者在中国关税史研究上的共识。外国经济上的强大再配合着政治上的特权，这就更加有利于外国势力的把持垄断，而中国则更加处于“情法两穷”的地位。^③ 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对外贸易之所以特殊，这是陷中国于“情法两穷”的买办制度之所以建立，这也是中国近代的买办阶级之所以反动。

当然，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入侵，包括贸易和投资在内，有促进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的一面，也给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作为“二传手”，买办阶级既有把外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传到中国广大小生产者身上的一面，也有把商品经济由通商口岸传到中国内地广大城乡的一面。还应该指出：外国资本主义对落后国家的入侵，由于被入侵国家内部条件的不同和整个国际条件的变化，会出现完全不同的结局。这里需要的，仍是具体的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对于这方面的问题，过去国内学者的研究得不够，缺乏应有的重视。这是今后的研究应该着重付出努力的地方。但是所有这方面的研究，也应该遵循同一原则，即分清主次，掌握分寸，问题的不同层次和范畴，在任何时候都是不能加以忽视的。对昨天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如此，对昨天中国社会的经济关系，亦应作如是观。

李时岳同志的大作严格地区分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的界限，认为“决不应忽略民族界限的大问题”。这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我认为进一步讨论买办阶级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并得出明确的认识，这更有助于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的中心线索的认识，这是没有疑问的。

（责任编辑：章鸣九）

〔作者汪敬虞，1917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① 1899年12月11日Herald，第1162页。

② 赵淑敏：《厘金与关税自主》，第12页，1984年5月。

③ 郭嵩焘：《郭侍郎奏疏》，卷一，第二五页，1892年版。